



中国近代文学史

主 编 任访秋

责任编辑 阎人

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开封市明伦街85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河南省兰考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6.625 字数:417千字

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 定价: 3.10元

ISBN 7-81018-166-1/1·22



主 编 任访秋

分编主编 关爱和 王杏根 张 中

中国近代文学史

主 编 任访秋

河南大学出版社

目 录

绪论 (1~27)

上 编

概 说 (31)

第一章 近代文学的先行者——龚自珍 (35)

第一节 生平及思想 (35)

第二节 诗歌创作 (41)

第三节 散文创作 (47)

第四节 龚自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53)

第二章 经世派作家的崛起 (59)

第一节 经世派作家崛起的历史背景和文学

主张 (59)

第二节 魏源 (65)

第三节 王韬 (72)

第三章 鸦片战争时期的爱国诗潮 (78)

第一节 爱国诗潮的形成 (78)

第二节 爱国诗潮反映的社会内容 (80)

第三节 宋前繁荣的讽刺诗 (85)

第四节 爱国诗潮的艺术成就及其影响 (89)

第四章 桐城派的中兴与复归 (92)

第一节 鸦片战争前后桐城派的发展与危机 (92)

第二节 曾国藩与桐城派的中兴	(99)
第三节 曾门弟子及桐城派的复归	(104)
第五章 宋诗派及其他诗词流派	(109)
第一节 宋诗运动兴起的原因	(109)
第二节 宋诗派的诗歌理论	(112)
第三节 宋诗派的诗歌创作	(114)
第四节 金和及其诗歌创作	(119)
第五节 蒋春霖及其《水云楼词》	(122)
第六章 十九世纪四十至八十年代的小说创作	(127)
第一节 《荡寇志》	(130)
第二节 《儿女英雄传》	(134)
第三节 《三侠五义》	(138)
第四节 狹邪小说	(143)
第七章 《艺概》及其他文论	(150)
第一节 刘熙载及其《艺概》	(150)
第二节 林昌彝及其《射鹰楼诗话》	(157)
第三节 太平天国的文学主张	(161)

中 编

概 说	(169)
第一章 资产阶级文学改良运动	(175)
第一节 文学改良运动的历史进程	(175)
第二节 文学改良运动的目标与内容	(180)
第三节 文学改良运动的历史意义	(187)
第二章 梁启超	(196)
第一节 梁启超的生平、思想和著作	(196)
第二节 梁启超的“文学改良论”	(200)
第三节 梁启超的文学创作	(207)

第四节 梁启超对近代中国文化事业的主要贡献	(216)
第三章 黄遵宪	(219)
第一节 生平与思想	(219)
第二节 诗歌创作	(223)
第三节 艺术成就及其影响	(232)
第四章 康有为及其他维新派作家的创作	(238)
第一节 康有为	(238)
第二节 谭嗣同 夏曾佑 蒋智由	(243)
第三节 丘逢甲与其他台湾爱国诗人	(249)
第四节 林 旭 刘光第	(254)
第五章 同光体及其他诗歌流派	(259)
第一节 同光体诗派及其诗歌理论	(259)
第二节 同光体诗派的诗歌创作	(263)
第三节 王闿运与汉魏六朝诗派	(268)
第四节 樊增祥、易顺鼎与中晚唐诗派	(271)
第五节 李慈铭	(275)
第六章 清末常州词派	(278)
第一节 谭 献 庄 楼	(278)
第二节 王鹏运 况周颐	(283)
第三节 朱祖谋 郑文焯	(290)
第四节 陈廷焯 冯 煦	(296)
第七章 谴责小说	(300)
第一节 谴责小说的兴起及其作家队伍	(300)
第二节 李宝嘉和《官场现形记》	(303)
第三节 吴沃尧与《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308)
第四节 刘鹗与《老残游记》	(313)
第五节 曾朴及《孽海花》	(318)

下 编

概 说	(327)
第一章 章炳麟	(337)
第一节 生平与思想	(337)
第二节 诗文创作	(350)
第三节 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影响	(359)
第二章 秋瑾及其他革命派作家	(362)
第一节 秋 瑾	(362)
第二节 邹 容 陈天华	(369)
第三节 章士钊 刘师培	(375)
第四节 金天翮	(387)
第三章 南社与南社诗人	(395)
第一节 南社	(395)
第二节 柳亚子	(400)
第三节 陈去病 高 旭	(405)
第四节 苏曼殊	(414)
第五节 黄节、于右任等其他南社诗人	(419)
第四章 革命派小说及其他小说流派	(424)
第一节 革命派小说理论	(424)
第二节 苏曼殊的小说创作	(429)
第三节 黄世仲的《洪秀全演义》	(434)
第四节 鸳鸯蝴蝶派的小说	(438)
第五章 近代戏曲	(444)
第一节 十九世纪中、末叶的传奇杂剧及地方 戏曲	(444)
第二节 戏曲改良运动	(450)
第三节 吴梅、姚华的戏曲理论研究	(458)

第四节	早期话剧	(461)
第六章	翻译文学	(466)
第一节	近代翻译文学的兴起	(466)
第二节	严复的翻译及其诗文创作	(471)
第三节	林纾对西方小说的翻译	(477)
第四节	苏曼殊、马君武、鲁迅等人的翻译活动	(481)
第七章	王国维	(487)
第一节	生平学术思想及成就	(487)
第二节	悲剧论	(490)
第三节	境界说	(493)
第四节	文学发展进化观	(497)
结束语	中国近代文学的渊源与流变	(503~521)
一	中国近代文学发展的思想渊源	(503)
二	西学输入对中国近代文学发展的影响	(510)
三	五四前夕的“打倒孔家店”与文学革命运动	(515)
后记		(522)

绪 论

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能与中华民族如此辉煌灿烂而又持续不断的历史文化相比者，确乎不多。在相对隔绝的地理环境和文化环境中发生发展并自成一体的华夏文明，曾有过极其显赫的过去，产生了令人惊叹的文化与文学。但进入近代以后，尤其是西方帝国主义的不断入侵与大规模的西学东渐，大一统的华夏民族和文化开始受到严峻的挑战与冲击。这不仅给民族的生存，同时也给民族文化与文学提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即如何对付、迎接这种不可避免的挑战与冲击，并在挑战与冲击中重新确立自己的方位，选择自己的出路。经过几代人的艰难曲折的探索和数十年漫长而急遽的变革，至五四时期，中国文化与文学终于出现了新的转机。如果我们把百余年来中国文学的演进历程视为一个不断走向开放的矛盾、艰难、曲折、坎坷的现代化进程的话，那么，毫无疑问，这一进程发轫于近代。

全面的危机，构成了近代中国文学发展的基本历史背景。这种全面危机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或者说侧面。即民族生存危机、封建社会的政治危机和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的危机。西方帝国主义的炮火轰开了中国的门户，惊醒了封建帝国的睡梦，把这个封闭已久的封建帝国拉入了开放竞争的近代世界格局。一次又一次的军事入侵与经济掠夺，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民族的危机迫在眉睫。民族矛盾一跃而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

主要矛盾。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最强呼声，也是全民族每一个个体必须承担的重要责任。这一前所未有的危机，从根本上改变了民族的生存意识，危机感与忧患感弥漫于近代先进知识分子之中。从觉醒的先进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到资产阶级的改良派和革命派，无不把自己的全部力量投入到挽救民族危亡和改革、革命的时代洪流之中。与此同时，随着帝国主义入侵的加剧与深入，进一步加速了徒有其表的腐败封建社会机体的瓦解、衰落与崩溃。一次又一次的农民起义，一场又一场的政治动乱，社会政治危机也达到了空前激烈的程度。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相交织，构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严重动荡与纷扰不安。昔日封建帝国的强盛已经变为自我安慰而又虚无缥渺的梦幻。这种内外交织的危机已使得封建社会无法按照传统的惯例，通过改朝换代的方式，调节自身的机能，恢复整个封建社会大系统的平衡与稳定。与民族生存危机和封建社会政治危机相伴随的则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的危机。这一危机以更加隐蔽的方式影响到近代中国社会的各个侧面，影响到近代中国文学的发展。

如果说，民族生存危机是以帝国主义的入侵为标志、政治危机是以封建政体失调和政治动乱为形式表现出来的话，那么，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的危机则是以中西文化冲突日益加剧、深化而显示出来的。发生于近代中国的中西文化冲突，是带有历史悲剧色彩的。这一冲突实际上是指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冲突。这是两种具有明显时代差异和根本性质不同的文化系统的冲突与交锋。这不仅是物质力量的交锋，用维特根斯坦的话来说，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图式”(World picture)，涉及到从语言思维体系、信仰追求体系、政治经济制度以至于人的生活方式和心态结构等系统整体的差异。(参见M.K.穆石茨著《当代分析哲学》中译本第394页)其整体功能的优势与劣势是不言而喻的。中国所面临的是一个在各方面都比

自己强大得多的敌人。值此民族危亡的严重时刻，中华民族在军事、政治上抗拒外侮的同时，也必然会张扬自己的文化传统，筑起心理上的文化防线，在这种背景下，两种文化系统与“世界图式”一旦相遇，冲突便不可避免。但是，以华夏为中心，以尊卑的文化心理和以儒家礼乐教化、纲常伦理作为判断异质文化唯一价值尺度的文化心理定势，曾经导致了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的困境和严重危机。这种困境和危机主要是指，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既缺乏内部的更新机制，压抑母体文化中的活跃因子，又无力扭转民族所面临的危机处境。危机本身便可能孕育着转机。“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战略口号所包含的价值取向，为处于困境中的中国文化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与出路。从技艺的学习到政治经济体制的借鉴，进而又到文化思想的大规模输入，中国文化为更新自己的机制，摆脱封闭、僵化、危机的困境，开始了艰难痛苦的跋涉。

因此，近代中国这一特殊的历史氛围，决定了救亡与启蒙、反帝与反封建必然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中心议题和首要任务。但救亡与启蒙、反帝与反封建，在近代中国的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又构成了两组既相互统一又相互矛盾，既相互交织而又有所背离的双重命题。近代思想、文化与文学的种种新旧杂糅与复杂矛盾性，均可在此找到问题的根结所在。在这一矛盾的历史运行过程中，救亡与反帝日趋深化，启蒙与反封建终于成为时代文化构成的迫切问题，中国文学也在此过程中逐步确立了自己的历史出路，开始了全面的从传统古典文学向现代文学的历史过渡。

在这种全面危机（民族生存危机、封建政治危机和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的危机）下孕育发展的近代中国文学，在其呱呱落地之后，时代之父便带领它开始了生命旅程上风驰电掣般的奔走。它来不及回味母体的温馨，来不及述说梦般的憧憬，来不及思考生命的归宿，甚至来不及舒展一下它早熟但发育并不健全

的肌体。历史的进程是那样的迅猛，使它不得不以匆忙而惶惑的目光全神贯注地注视着瞬息万变的现实世界。全面的危机象一股股强大的脉冲，使它的心灵为之阵阵颤抖。它毫不犹豫地运用并不纯熟也无暇雕琢的艺术手段，参与了历史的进程。它不仅从各个侧面，真实而全面地反映了这种危机，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同时又记录了民族心理结构、价值观念和审美意识的深刻变迁过程。它不仅反映了中华民族所蒙受的种种屈辱与在屈辱中爆发的空前的救亡反帝热情，而且也记录了中华民族为抛弃沉重的历史包袱，进行启蒙与反封建的艰难步履。新旧文化意识的交错杂陈与激烈交锋，决定了近代中国文学是一个矛盾复杂的混合形态。传统文学的弊端与必然衰落在近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得以证实和宣告，而新世纪的文学萌芽又在此过程中得以孕育、成长。也许从整体上看，近代中国文学本身并没有达到审美表现与完善的较高层次，但由于它的艰难探索，却为它以后的中国文学奠定了基础，指出了根本方向与出路——走向现代化之路。

仅有八十年发展历史却是跨越时代的中国近代文学，犹如一部由数代人参加的，分别代表不同阶级、不同阶层思想情绪和审美趣味的多声部合唱，合唱中的杂乱与不和谐是十分明显的，但在杂乱与不和谐中，救亡与启蒙、反帝与反封建的主旋律却是异常嘹亮。正是由于这样，近代中国文学与近代中国历史现实保持了紧密的联系，与近代中国社会进程、文化思想变革形成了一种共感共振效应。鉴于此，我们在把近代中国文学视为中国文学走向现代化的历史开端的同时，依据近代中国救亡与启蒙、反帝与反封建运动发展的节奏和文学发展所呈现出的阶段性，将近代中国文学的演变过程分为三个历史时期：

一、鸦片战争与洋务运动时期——近代文学的萌生与古典文学的衰落期。

这一时期的救亡与启蒙运动是遵循着补天自救——避害自卫——中体西用的逻辑顺序展开的。进入十九世纪以来，清朝统治已由康乾时期的巅峰状态走向衰敝，昔日的东方帝国面临着四处潜伏的危机，政治腐败，经济凋零，军备松弛，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天灾人祸连年不绝。面对江河日下的社会局势，一种由危机感而触发的忧患意识在士大夫阶层逐渐蔓延。出于一种起衰救敝的补天愿望，他们首先在学术界发难，倡言革除烦琐、空疏的学风，呼唤明末清初出现过的经世致用思潮的复归。同时，他们激烈地抨击社会的各种弊端，以与天朝盛世的睡梦极不和谐的音响刺激浑浑噩噩的国人。这是十九世纪以来第一次具有微弱启蒙意义的动作。

鸦片战争的爆发，扰乱了中国封建社会缓慢发展的旧有秩序：“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二页）在战争带来的生存危机面前，出于一种避害自卫，除弊御侮的目的，中国的先进人士开始了对现存政治、思想、文化多方面的批判、检讨与反省。反省仍是在传统的华夏中心与以夏变夷的思想基础上进行的，他们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战争的对手，代表的是正在世界范围内泛滥的新兴的资本主义洪流，鸦片战争也仅仅是帝国主义把中国卷入世界市场，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第一步。他们过分信赖封建帝国的强盛和以往处理夷敌局部战争的经验，因而对这场“亘古未有之变”总是保持着一种盲目乐观的情绪。对内，他们希图以自救的方式，通过现有政体与思想文化机制的自我完善与调节，使旧有秩序的紊乱趋于正常。对外，他们以为学得对方的船坚炮利，修缮加固城池海防，自可化险为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与鸦片战争前夕兴起的经世致用思潮自然地融合，形成了这一时期思想界的旗帜。

“经世致用”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潮在一定程度上转移

了士大夫阶层中空疏、烦琐的学风，促使一部分知识分子把目光转向社会现实与对中国之外世界的注意。但这种远远不够的救亡觉悟仅仅为少数先进知识分子所具有。与中国之外世界的长期隔绝，妄自尊大的民族文化心理与麻木愚钝的精神状态，扼杀与阻止了全民族范围内的救亡总动员，生存危机意识并没有为全民族所共同接受。封建宗法制度、封建伦理纲常仍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对西方世界的了解与借鉴也被牢牢控制在“中体西用”原则所能允许的范围之内。

历史发展所带来的严酷事实是：中国封建政体与意识形态的腐朽已到了再不能亢奋起来的地步，微弱而有限的机制调节在强大的资本主义势力的进攻面前，几乎没有产生任何效应。经历了多次失望之后，在早期改良主义者中，终于萌生了朦胧的政体改良的要求。这是十分可喜的思想进步，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文学的触觉是异常敏感的。东南沿海的炮声，打乱了封建士大夫悠游从容的步武，他们从神韵、格调、性灵的艺术梦幻中惊醒。面对血与火的社会现实，以高遏入云的嘹亮歌唱，代替了往日的浅唱低吟。这种以揭露侵略者暴行，抨击清政府及军队腐败，歌颂抗战英雄，宣扬抵抗意识为主题的歌唱，汇成了鸦片战争时期的爱国诗潮。爱国诗潮很快与先于它们出现的经世致用文学思潮汇拢，形成了鸦片战争时期议论军国、臧否政治、描摹时变、慷慨论天下事的文学主体精神。近代文学发展过程中所呈现的文学与政治空前紧密结合，与救亡启蒙运动亦步亦趋、息息相关的发展趋势，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爱国诗潮是居于不同社会地位，抱有不同艺术追求作家的共同歌唱。战争没有引起中国知识分子深层文化心理结构的变化，因而爱国诗潮所表现出的感慨忧愤与文学史上曾经有过的战乱文学相比，并没有明显的超越。在经世致用思想被学术、文学界普遍接受的同时，晚明以来形成并发展的人本主义和反理性思想却